

东方名家

2012·1·9 星期一
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



观念平台

庄迪澎 《独立新闻在线》创刊
总编辑 (2005~2011)
teckpeng_chang@gmail.com

在张晓卿于2006年「正式」兼并南洋报业控股前，四大报的新闻从业员早已不能在四大报之间跳槽了。劳方的谈判筹码，不仅是因为跳槽空间被挤压而大不如前，也因为大专教育普及，为报业提供大量的人力储备，随时可取代因不满待遇而告别报业的雇员，资方自然有恃无恐。

历经2001年「报殇」、2006年张晓卿「正式」兼并南洋报业控股、2008年与香港明报合并为「世界华文媒体集团」、2009年世华媒体年报号称在我国中文日报读者群占有高达93%之后，若仍为「张晓卿有垄断中文报业」争论不休，已无意义。垄断是既成事实，吾人更应关注和考察中文报业的垄断局面已造成什么恶果，例如内容肤浅化、舆论同质化，乃至加剧劳资关系的失衡等。

在我国中文报业的劳资关系中，新闻从业员堪称不曾占有优势。在1990年代以前，至少有二大因素造成中文报业新闻从业员处于劣势：

一、在1980年代工业化政策产生效应之前，工商业活动不如后来蓬勃，广告开销(adex)有限，且人们购买力较低，多家报社在有限市场里激烈竞争，挣扎求存，难以获利，劳方难以争取较优待遇。

二、早期的新闻从业员多无大学学历，南大毕业生或留台人则可能碍于个人语言适应能力，以致报社成了独中以外另一个难得的就业场所，不易另谋高就。此现实造成资方抱有一种既嚣张又妄自尊大的心态，认为这些雇员无处可去，他们需要报社更甚于报社需要他们（甚至到了1990年代中期，一些报社主管仍然有此心态）。

《新明日报》、《通报》、《星报日报》、《建国日报》、《新通报》等报社在1980年代和1990年先后停刊，中文报业在

八方论见 · 吴启聪

自由撰稿人

最近我国的政治局势，似乎都把全部焦点都放在了1月9日的安华案件判决日。公正党已经悄悄言将会发动大型示威，而国阵又会如何招架呢？还有待分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安华案件的判决，不管是罪名成立还是无罪释放，都将会牵动到全国的政局。

如果说安华被判无罪释放，那么到时国阵就必然会被指责为诬赖安华的始作俑者，整个国阵的公信力，尤其是巫统，都将会立刻跌破谷底。如今马来选票和印度选票正值大量回流国阵之际，若是被这一单案件给搞砸了，恐怕下届大选国阵不但无法夺回三分二优势，甚至连政权都有可能拱手让人。

如果说安华被判罪名成立，那么到时简直就变成了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的再版。公正党党员，还有其他民联盟党，都将会率领

安华判决牵动政局

人民走上街头，历史重演当年的烈火莫熄。根据1999年的大选成绩分析，当时烈火莫熄的效应，对国阵和巫统的马来选票，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，当时的国阵甚至需要依赖华人选票才可以勉强过关。

1999年的华社一反常态，倒转过来说支持国阵，纯粹是因为华社害怕社会动荡，基本上认为只要国阵保住政权，即能保障国家的安稳。因此，有者认为，如果烈火莫熄再次发生，华社又会基于同样的原理，再次调转枪头支持国阵。笔者并不认同如此说法，华社害怕社会动荡的导因，并不是在于烈火莫熄，而是在于1998年的印尼种族大暴动。

当年1998年突如其来印尼种族大暴动，确实对我国华社的心理造成了相当的恐慌。而同一时期爆发的烈火莫熄，公正党的马来人纷纷走上街头，吉隆坡全城动荡的画

面，确实让当时华社的恐慌再次升级，促使华社转投国阵，盼望国阵能够结束这一切乱局。但换成今时今日的局势，以上历史情节绝对不可能再度发生在当今的大马了。纵观当今华社求变的心态，已是不惜一切代价，都要让国阵倒台。街头骚乱和伊斯兰教国对于当今华社而言，都已变成了无稽之谈，即使变成事实他们也都不相信。在这种心态下，不论国家陷入何种动荡，华社都不可能因此转投国阵。反而马来选民的心态转变，极有可能成为压死国阵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虽然说，安华的案件不应被泛政治化，但实话说一句，安华入狱与否，岂能与政治无关？不管安华最终是被判无罪释放，还是罪名成立，国阵注定是唯一和最大的输家，前者只输一半，后者则输清光。国阵唯一可以捞取的好处，在于安华退出政坛后，公正党将会迅速崩溃，而整个民联也将会跟著瓦解。不过若跟国阵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相比，这绝对不算数。

垄断的报业不利劳资谈判

——传媒论衡（二）



报业垄断局面导致劳方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劣势。

1990年代形成星洲媒体集团、南洋报业控股两大集团对立，《光华日报》则偏安北马。销量与读者人数的竞争，主要是《星洲日报》、《中国报》及《南洋商报》三强鼎立。此时，国家整体经济条件比1980年代好，工商业活动蓬勃，中文报业一方面因业者减少，另一方面因广告收益增加，以及人们购买力提升使得报纸销量提高，开始告别1980年代惨淡经营的窘境。

竞争增加工会谈判筹码

若说此时有对劳方稍微有利的局面，应是星洲媒体集团和南洋报业控股的竞争，使得职工会稍有谈判筹码，个别雇员亦可通过跳槽谋求较好的待遇。当时中文报业有个相当流行的趣闻：《中国报》为《星洲日报》培训新人，《星洲日报》则为《南洋商报》培养资深记者。两大报业集团宣布年终花红前，常会采取「观望」态度，等待对手先宣布。此一现象说明，资方或多或少还是在意花红对比手差所造成的观感，以及它对旗下雇员所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。

在2001年「报殇」及张晓卿垄断四大报之后，1990年代劳方的相对优势已成往事，其对劳动条件的不利影响可说立竿见影。「报殇」期间，我曾撰文评论当时

《南洋商报》和《中国报》职工会期待借由采取「中立」立场换取「新业主投桃报李」，是何其天真的假设：一位署名怀谷的作者撰文回应，认为劳资协议的谈判讲究实力和技巧，且「职工会经常派送其会员或领导层去全国职工总(MTUC)接受全面系统的训练……合约谈判技巧、公司财务分析、领导素质、口才训练、实地谈判训练、实地法庭见习等课程，同时也聘请专家，包括心理战术专家，训练工会谈判战术和战略的应用」，加以「长期斗争经验告诉我们，只要工人团结一致，没有难不倒我们的」。

无论就当时而言，或是十年来的事证，这番回应都缺乏说服力。谈判技巧固然重要，但在职工会领导学习谈判技巧的当儿，资方也有谈判技巧，甚至可能比职工会更高明。别忘了，曾任职工会领导人的中文报社中高阶主管大有其人，例如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刘鉴铨是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职工会(NUJ)创办人之一，且任总秘书长达五年；首席执行官许春、总编辑下亚烈、执行总编辑郭清江、副总编辑林瑞源，也曾任新闻从业员职工会星洲日报分会主席和秘书等职。

垄断了，跳去哪里？

在彼此皆掌握谈判技巧的情况下，劳资谈判哪一方较占优势，端赖相关产业的外在条件。经济学已教会我们，人浮于事的时期，资方有较好的议价筹码，不会以高薪征才；反之，只有在工人难找，且资方急需充足人力从事生产时，才会愿意以

较好的待遇征才。世华媒体控制四家中文报社之后，从前新闻从业员从《中国报》跳槽《星洲日报》、从《星洲日报》跳槽《南洋商报》之情景已无可能出现。虽有《东方日报》和《光华日报》，但它们规模较小，职缺不会比从前多，选择自然比从前稀少。此局面势必使得资方占尽优势，劳方则处劣势。

在张晓卿于2006年「正式」兼并南洋报业控股之前，四大报的新闻从业员早已不能在四大报之间跳槽了。劳方的谈判筹码，不仅是因为跳槽空间被挤压而大不如前，也因为大专教育普及，劳动市场为报业提供大量的人力储备，随时可取代因不满待遇而告别报业的雇员，资方自然有恃无恐。

资方的有恃无恐，在劳资集体协议谈判中暴露无遗。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职工会星洲媒体集团分会自今年3月就开始和资方展开谈判，历时9个月、至少八回合的谈判拉锯战；根据职工会的说法，虽然从最初提出的调薪18%，退让至17%，再退让至8%+RM150，但「经过三轮的会议后，资方就以「不退让就免谈」的姿态来跟职工会谈判，且「强力声称所给予的调薪方案已是Final，『没有得再好给』」。

资方有恃无恐，对黑出劳方的无力感；职工会最终不得不妥协，接受远低于所求的5%+RM180调薪方案（2005年是6%+RM115、2008年是6.5%+RM120）。讽刺的是，世华媒体2011财政年度的税前盈利再创新高，达到7,420万7,000美元，税后盈利是5,578万5,000美元，都比前一年增加了35%。

星洲媒体集团的一名雇员曾给我捎来电邮，有一段写道：「今天星洲内很多员工，不管是新的或是旧的，心中都是一个字：『跳』。但是，垄断了，跳去哪里？所以，他们（指高层）摆出不可一世的态度，不管是对内部员工还是对外大众，你奈我何？」这番心声不就是反映了新闻从业员在垄断局面中的郁闷吗？